

分异与融合

转型期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

沈洁 著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SOCIAL SPACE IN TRANSITIONAL URBAN CHINA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异与融合:转型期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沈洁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8
ISBN 978-7-309-15711-6

I. ①分… II. ①沈… III. ①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01137号

分异与融合:转型期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

FENYI YU RONGHE; ZHUANXINGQI ZHONGGUO CHENGSHI DE SHEHUI KONGJIAN

沈洁著

责任编辑/朱枫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102580 团体订购:86-21-65104505

出版部电话:86-21-65642845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字数 124 千

202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5711-6/C·415

定价: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1

第二节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动力机制 / 4

第三节 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融合 / 7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9

第五节 本书结构 / 11

第二章 住房商品化与城市居住景观重塑 20

第一节 引言 / 20

第二节 理论框架 / 23

第三节 中国城市的住宅景观和住房开发 / 27

第四节 怀旧城市：太平桥地区更新项目 / 35

第五节 异域风情：“一城九镇” / 39

第六节 东滩生态城 / 45

第七节 结论 / 51

第三章 市场转型与社会经济隔离

62

第一节 引言 / 62

第二节 制度视角下的社会经济隔离 / 65

第三节 住房改革后中国城市的居住隔离 / 68

第四节 数据和方法 / 73

第五节 上海的社会经济隔离 / 79

第六节 结论 / 90

第四章 跨境移民的空间集聚与影响机制

103

第一节 引言 / 103

第二节 理论框架 / 107

第三节 数据与方法 / 111

第四节 境外人口空间集聚特征 / 115

第五节 境外人口空间集聚的影响机制 / 119

第六节 结论 / 122

第五章 外来移民的居住区位与社会融合 129

- 第一节 引言 / 129
- 第二节 居住区位与移民融合 / 130
- 第三节 中国城市移民的社会空间排斥 / 133
- 第四节 调研与数据 / 136
- 第五节 居住区位对移民融合的影响 / 140
- 第六节 城市移民空间同化的决定因素 / 148
- 第七节 结论 / 149

第六章 郊区新城的社会空间融合 159

- 第一节 引言 / 159
- 第二节 重新认识“郊区”的社会空间 / 161
- 第三节 中国城市郊区的社会空间研究进展 / 164
- 第四节 郊区新城的社会空间融合 / 165
- 第五节 结论 / 171

第七章 内城社区的公共设施与社区参与 176

- 第一节 引言 / 176

- 第二节 公共设施与社区参与 / 178
- 第三节 后单位制时期的设施共享与社区参与 / 181
- 第四节 数据与方法 / 184
- 第五节 分析结果 / 188
- 第六节 结论 / 198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城市社会空间一直是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19 世纪末,布斯(Booth, 1902—1903)根据实地调查所绘制的一系列伦敦社会地图,标志着对城市内部社会空间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始。20 世纪初,以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及其同事为代表的芝加哥社会学派发展了城市生态学理论,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空间分布进行解释(Park, 1915; Burgess, 1928)。1960 年代以来,相关研究逐渐打破经典生态学理论,转而关注不同社会角色在塑造空间不平等中的作用和机制(Castells, 1977; Lefebvre, 1991; Gottdiener, 1994)。

最近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在三个新兴趋势下展开。第一,在全球范围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政策的转型背景下,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城市空间更加分化(UN-Habitat,

2001; Marcuse, 1997)。第二,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张,城市化以更大尺度展开,在区域城市化、星球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结构趋于多中心化,新的城市形态不断涌现,基于传统城市概念的社会空间研究亟待突破(Soja, 2000; Brenner & Schmid, 2012)。第三,经典研究大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特别是美国的城市实践。新兴的后殖民主义城市理论指出,应通过研究欧美国家以外的其他地方,重构城市理论(Roy, 2009; Robinson, 2016)。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社会空间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Maloutas & Fujita, 2012)。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具有均质性、标准化和无阶级性的特点(Lin, 2007)。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以快速工业化为基础,城市是生产而非生活的中心,国有企业和其他类型的组织管理的单位大院是城市的基本空间单元(Bray, 2005)。单位大院大多是独立的社区,为职工提供工作、住房、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设施。不同工种和级别的城市居民,混居在其供职的单位大院,避免了在城市尺度上按社会阶层的居住分异。社区的特征更多取决于单位的特征。同时,由于在单位大院内部,居民因工作原因而彼此熟悉,其社会关系主要以具有地域特征的邻里关系为基础。换言之,由于缺少多样性、异质性和匿名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并不存在(Park, 1915; Wirth, 1938)。

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给曾经高度整

合的城市社会带来了冲击。以单位大院为基本单元的蜂窝状结构逐渐解构,门禁商品房住区成为中国城市居民普遍的居住形式(Wu, 2005)。日益扩大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则通过基于市场机制的居住分类,重塑城市的社会空间。中国城市社会空间从高度整合且混居状态,逐渐转向以各种新兴飞地社区为特征的碎片化(He, 2013)。与此同时,居民在家庭、亲属和工作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不太受地域限制的社会网络(Hazelzet & Wissink, 2012)。以邻里为基础的社区共同体面临消失的局面(桂勇、黄荣贵,2005)。

迄今,已有大量研究考察了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一方面,实证研究表明,到20世纪末,中国城市基于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居住隔离程度仍相对低于西方城市。由于制度遗产的作用仍然显著,城市社会空间呈现出隔离与混合的复杂模式(Li & Wu, 2008)。另一方面,不同社会群体的空间聚居现象初现端倪,如绅士化(He, 2010)、郊区化(Shen & Wu, 2013)、贫困人口聚居区(Wu et al., 2010)、流动人口聚居区(Wang et al., 2010)等,反映了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日益分化。

在此背景下,很多重要的问题仍有待系统深入研究:随着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全面停止,市场成为城市住房供给的主要渠道,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程度如何变化?社会空间分异在哪些维度展开?空间分异又如何形塑城市社会?本书以上海为例,探究上述问题。

第二节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 分异的动力机制

对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源于对市场化改革空间后果的关注。改革以前，城市社会空间是计划经济下以单位制为核心的城市治理模式的产物，市场化改革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是否打破了空间的均质、塑造了新的社会空间秩序？塞勒尼(Szelényi, 1996)、诗科拉(Sýkora, 1999)等来自中东欧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学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后社会主义城市中空间的社会分化程度将不断增加。这一假设也引发了大量对中国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Li & Wu, 2008; He, 2013)。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市场转型并非简单地从此类型向彼类型转型的过程，其空间后果也是如此。首先，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市场空间和社会主义空间遗产往往混合并置，形成独特的转型混合空间性(hybrid spatialities of transition)(Golubchikov et al., 2014)。其次，城市社会空间及其社会经济效应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Burgers & Musterd, 2002; Brown & Chung, 2008; Reardon & Bischoff, 2011)。除了经济形态以外，制度、文化、历史甚至自然禀赋等因素都会影响新的城市社会空

间格局。最后,独特的地方制度安排和政策通过调节结构转变的影响,在城市社会空间重构中发挥关键作用(van Kempen & Murie, 2009)。因此,对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及其动力机制的研究,需要超越线性进化的视角,理解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互动以及背后的制度框架。

市场化是影响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首要因素。一方面,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果之一,居民的收入分化急剧扩大(Wang, 2008; Xie & Zhou, 2014)。尽管这一趋势仍然与社会类型有关,但是个体的市场能力(如教育、收入、职业等)与生活方式在决定社会经济地位中日益重要(边燕杰、张展新,2002;李春玲,2005;Song & Xie, 2014)。另一方面,土地和住房市场的建立为城市空间商品化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Wang & Murie, 1999; Yeh & Wu, 1996)。特别是1998年住房福利分配的全面取消,商品住房成为新住房供应的主要手段,带来了居住分类机制的变革。

全球化反映了对外开放政策给城市社会空间带来的影响。外国投资开始重新定义城市开发的逻辑,对高质量办公空间和住宅的需求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来自境外的管理人员和本地雇员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不仅是消费主义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践行者,也是高端商品住宅的主要消费者(Farrer, 2019; Chen & Sun, 2007)。为外籍人士开发的封闭住宅小区日益增多,形成了特定的细分市场(Wu & Webber, 2004)。与此同时,高涨

的生活成本和住房成本,使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益发边缘化,从而加剧社会空间的分层。

城乡二元化所导致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是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在城市内部的延续。城市经济的转型和外国投资的注入,给劳动力供给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国家通过创建各种新的身份(如暂住证、居住证等),鼓励农民进城工作,劳动力乡城流动控制逐渐放松(Chan & Zhang, 1999; Zhang, 2012)。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仍然很难获得当地城市户口以及与此关联的社会福利,户籍制度等原有体制性因素仍然发挥着社会排斥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住房获取成为对外来移民的新的社会排斥机制(方长春,2020)。城市中的农民工聚居区正是在这样双重社会排斥下形成的。

在以上三个趋势的共同作用下,改革时期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本质,实际上是经济积累体制转变的结果(吴缚龙、李志刚,2013)。与西方城市在后福特体制下出现社会极化和空间重构所不同(Walks, 2001; Scott, 2011),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则与世界工厂体制的建立有关。一方面,在世界生产跨国性重组的趋势下,中国以充足的原材料、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彻底改变了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处于劳动力市场上层的精英群体,是实现跨国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包括来自境外和境内的高技术移民群体。处于劳动力市场底层的是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们虽然满足了制造型企业对大

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但是往往无法获得城市户口和公民身份,被视为城市社会的“外来人口”。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持有城市户口的半技术型劳动力群体(Fan, 2002; 佟新, 2008)。处于劳动力市场不同地位的三类群体——跨境移民、外来移民和本地人口,形成了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基础(沈原, 2006; 佟新, 2008),也是城市空间分异的基本维度。

另一方面,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模式,则为打造世界工厂提供必要基础(Shen & Wu, 2017)。伴随着城市治理的分权,地方政府积极通过出让土地、吸引投资以获得GDP(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与此同时,通过新城建设、旧城改造等措施,土地和住房市场得到充分发展,土地财政规模持续扩张,地方政府用以发展经济的财政收入得以维系(Tao et al., 2010)。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成为城市居民居住分类的主要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通过房地产市场,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社区聚居,城市社会空间呈现分割与破碎。居住分异既是这种分割的结果,也是形成这种分割的一种空间手段(吴缚龙、李志刚, 2013)。

第三节 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融合

不同社会群体的聚居与相互隔离是社会结构在空间上

的反映；但是，空间隔离对于社会融合的影响却争议很大。空间分异往往与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政治等方面一样，被视为社会排斥机制的组成部分(Smets & Salman, 2008)。然而，很多学者在邻里与社区内部进行分析，强调空间隔离实际上是社会群体保持特定的社会距离以维系社会生存的策略，有益于增加地方依附感和社会融合(Marcuse, 1997)。

对于中国城市而言，空间分异与社会融合不一定是直接相反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社区尺度上的调节作用有关。首先，在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过程中，原有传统社区、单位社区与新兴商品房社区(包括跨境移民社区)、外来移民社区并置。不同社会经济人群聚居在不同类型的社区，形成城市社会融合的微观尺度。传统社区与单位社区的居民，往往是本地、原国有企业或单位职工，依赖固有的邻里网络和本地社会支持(Wu & He, 2005)。新型商品房社区的居民，基于身份认同和财产利益，往往形成利益共同体(Read, 2003)。外来移民聚居在城中村社区，因同乡、同工或者同业等关系(项飏, 2000; 李志刚等, 2011)，形成社区共同体。与此相反，在物理上接近的混居社区中，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却未必更多，例如，散居在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中的外来移民，实际上很难融入本地社区网络。

其次，政府的作用与能力不容小觑。自 2000 年开始，为了应对单位制的瓦解、大规模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城市社会的多样化，政府开始通过“社区建设”重新建立起一个

可以将城市人口都纳入其中的管理体系(Bray, 2006)。随着“社区”被制度化为一种行政地域单元,“社区建设”本质上成为一种空间治理策略。一方面,通过居民委员会专业化、志愿者动员、基层党建等方式管理社区,政府得以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在社区尺度上协调各方利益、化解冲突,维持社会稳定(Tang, 2020)。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如营造公共空间、强化公共服务等,“助推”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促进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熊易寒,2020)。诚然,政府的作用在不同类型的社区、对于不同社会经济人群有所不同。商品房社区的居民往往在居住区以外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对社区事务与社会交往缺乏兴趣。在衰落的传统社区和单位社区,政府在为居民提供社会服务、社会保障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此外,社区建设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当代城市中生活共同体的形成,仍有待研究。然而,在通过社区实现城市领域化治理的过程中,空间实际上成为促进社会整合的一种途径。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书以上海作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深度个案研究,发掘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普遍性问题与解释框架。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上海在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

研究中都具有重要价值。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火车头”，城市开发由工业区和工人新村项目主导。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座城市成为对外开放的“龙头”，是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实施的关键节点，堪称世界工厂模式的典范。与此同时，上海市政府一直是单位制改革、住房市场化以及城市建设的先锋，城市社会空间变动明显。换言之，上海的经济社会转型与空间重构，代表了中国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趋势。此外，对上海社会空间进行研究的中外文献也非常丰富，为本书展开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本书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首先，人口普查数据与实有人口数据是用于刻画上海宏观社会空间特征与变迁的主要数据来源。值得一提的是，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本研究得以对上海住房改革后第一个十年的社会空间变化进行历时研究。同时，基于微观村居委的数据，研究也准确地反映邻里尺度的社会分异特征。其次，本书用来研究居民个体层面社会融合特征的数据，主要来自2013年和2016年的两次问卷调查数据。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人口普查中的个体层面数据仍然很难获得，并且也未能涵盖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第二，这两个调查都是由正规专业调查机构进行，并且获得了街道、居（村）民委员会基层机构的大力支持，确保了调查数据的质量。最后，一手访谈数据和二手资料数据，也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笔者从2010年起，持

续对上海城市住房开发过程中各类行为主体进行了深度访谈,包括政府官员、规划师、设计和咨询顾问、地产开发商、房产中介、居民委员会成员以及房屋购买者,同时收集了大量正式出版的相关资料与报告。各类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将在相关各章中具体说明。

第五节 本书结构

本书将社会空间置于城乡二元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从宏观城市和微观社区两个尺度,对 21 世纪以来上海社会空间变迁的机制和效应展开实证研究。本书也注重将中国城市作为案例,放置于比较视野下进行思考,发掘中国的独特性对于理解转型城市社会的普遍意义。本书将揭示中国城市社会空间从相对均质、混居状态,逐渐转向以各种新兴社区为特征的差异化,与此同时,在社区层面形成同质社区。伴随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城市治理体系的发展,社区成为促进社会融合的新尺度。

第二章聚焦城市社会空间演变的物质基础,考察转型期城市居住景观多样化的动力机制。这章首先分析后改革时期体制和社会转型对当前城市住房生产和消费产生的深远影响。然后从城市增长机器的理论视角切入,对上海三个住宅项目开发策略、开发过程、增长联盟等进行深入分